

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 資料選輯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

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

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明莊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1/32·4 1/8印張·76,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8,750 定價：(9) 0.80元

統一書號：11018·464 03.9.京型

序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篇章，从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鸦片战争时期有进步倾向的士大夫思想是这个新篇章里的一页。

马克思对鸦片输入和鸦片战争所作的一系列分析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指示了捷径。马克思写道：中国禁止鸦片贸易，是由于英国政府在印度取得鸦片垄断权引起的。中国立法者加诸本国頑梗臣民的严惩和有关的禁令都归于无效。中国人民在道义上抵制鸦片，结果是清朝官吏普遍地为英国人所腐化。“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① 马克思又写道：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国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各个部分的精神联系。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僚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南方各省的群众因此率先起义。“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②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两个基本事实：鸦片输入、英国侵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破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和中國人民由此覺醒起來，展開反抗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勢力的鬥爭。

中國在鴉片戰爭時期還沒有跨出封建社會的大門。封建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對自己的環境、時代作出科學的判斷。然而按照馬克思的指示去觀察，我們就發現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對環境有很敏銳的認識，時代劇變在他們的思想上有鮮明、強烈的反映。

回顧一下鴉片戰爭以前半個世紀思想界的狀況，主要是頌揚封建統治，謳歌“升平盛世”；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極少深刻的反映，思想領域里充滿一片冷落沉寂。

半個世紀以前，堅守封建倫理的程朱理學照舊是受統治者表彰優寵的正統思想。由清初萌芽發軔的正統漢學在思想界氣勢正盛。有人形容那時是家談許鄭，人說賈馬。力求脫離現實，埋首舊紙堆里，成為這派學者的特色。絕口不談政治，就是他們的政治態度。林林總總的士大夫里雖然有人對當前統治流露出一些不滿，也是隱蔽曲折的。並且他們之中，有些議論表面帶有抗議精神，實際上是有無意為封建統治辯護。洪亮吉的某些思想就是如此。十八世紀末，洪亮吉寫的一組名為《意言》的論文極力發揮這樣一個見解：有清百餘年中社會比較安定，人口增長迅速。同一個時間，耕地與房屋不過增加一倍，頂多增加三倍五倍，戶口的增加卻多至十倍二十倍。因此，“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再加以豪強兼并，一人佔據百人的房屋，一戶佔據百戶的土地，許多人要飢寒顛踣而死，那就不足為奇了。洪亮吉的見解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① 馬爾薩斯把社會現象變成自然現象，把無產階級的貧困看做是它本身的罪過，並且主張因

^① 洪亮吉(1746—1809)，《意言》1793年成書。馬爾薩斯(1766—1834)，《人口論》1798年初版。洪亮吉要算是“人口論”的發明者。

此惩罚它；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阶级剥削压迫都被轻轻掩饰了过去。那是一种为资本主义脱教的虚伪愚蠢的理论。洪亮吉区别于马尔萨斯的，只在于他为之粉饰辩护的不是资本主义，是中国封建制度。他的这种理论不是对封建制的抗议，只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良心安慰。一句话，那时士大夫里面很少有集中抨击封建统治的，更没有人去注意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也没有在士大夫认识上引起什么风浪。十九世纪初，还只有少数人比较肯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发出“衰世”已经来临的叹息。

为什么是这样？当然是由于长期停滞的社会生活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尚处在初期；清政权的统治也比较巩固，比较有力，半个世纪以前一样有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人民一样是在漫漫长夜里生活。在封建士大夫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群众不起来“造反”或者“造反”而不过度摇撼封建统治，就不是严重的问题，就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英国攻打中国门户的炮声惊起了封建士大夫中一部分人要出来看看现实、看看世界。这派士大夫人数不多，影响不小。主要的代表者是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龔自珍、魏源、包世臣、张穆等人。他们彼此虽有差异，基本的立场和思想倾向则是共同的。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反，这部分人照旧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的，他们刚刚接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边沿，封建生产方式仍是他们的根基。与同一个时期那些浑浑噩噩、因循保守的士大夫相比，这部分人就要开明一些，乃至带有叛逆性格一些。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社会生活中的严重矛盾和危机。马克思指出的英国侵入加给中国的灾难和中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事实，由这些士大夫一一用自己的语言作了记

录,作了描写。

《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里收录的就是这种记录、描写的一部分。

关于清政权的封建主义统治,他们指出:吏治暗无天日,武力已不可靠,这个政权完全失去活力,成了一具五官犹存,关窍不能运转的僵尸;它的“盛极之时”早已过去。

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臚书》说:海内虚耗,官吏玩怠,地方官“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黑暗如此,“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吾意天日之梦梦也,雷霆之暗哑也,鬼神之冥漠也。不然,未有不震怒而夺其魄者”。金应麟《水师操演废弛請飭查究折》说,清军武备废弛,“需用之时,不惟急切难恃,即有忠勇大臣,亦至束手无策。……水师之败坏,未有似今日之甚者也”。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論》说,“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陈庆镛《申明刑賞疏》更公开指責最高統治者“刑賞失措,无以服民”。吳嘉賓《論内外罔欺疏》说,“逆夷深入,并无一人迎敌,即已失地。……窃見无识者流,皆謂国家无人、无兵,无粮、无餉无器械,不得不从权宜。”中国在抵抗英国侵略的战争中遭到的失败,就是这个統治势力的反动性决定的,是这个統治腐朽已极,对外屈服投降的结果。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一开始就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統治者走的是屈服投降的路线,人民走的是坚决抵抗的路线。由于这个事实,这些士大夫相信“民心可用”,主张依靠群众,用类似游击战争的办法与英军作战。林则徐、邓廷桢《繕陈英夷詭詐各情形片》说,“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恨之刺骨,即漁舟村店亦恨其强梁,必能自

保身家，团練抵禦。”陳金城《籌守福州議》說：“朝廷額設之兵，兵不習戰，罔知炮法，一旦有急，拱手就戮；否則聞聲先潰耳，庸有濟乎？計莫如團結鄉民，募之宜早，練之宜勤。以父兄子弟之兵，守桑榆父母之邦，誠為至便。”《夷氛紀聞》上載臧紆青的建議：“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尅期日；水乘風潮，陸匪丛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即殺，遇船即燒。……人自為戰，戰不擇地。……然後應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逼而盡歼之。”廣州三元里和沿海群眾的英勇鬥爭特別使這些人感到人民確實有力量，認為要抵抗外國侵略，就應當運用這種力量。包世臣《致祁大臣書》說：“廣州三元里義民，被毒不甘，集鄉人歼其渠魁。有司反為逆夷請命，致留遺孽。嵎山之沈山头義民憤切同仇，再破其火輪兵船，夷匪不敢言復仇，……是草澤中固大有人在。……患在封圻節鉞不知既不求，知者復不用，甚且塞其志氣，沮遏其忠憤，以餒吾士氣而張賊威耳。”王拯《送龍翰臣典試粵東序》說：“廣州三元里義民，激于愁憤，一呼千萬，俟夷酋登岸而圍數重，聚將歼焉。守土吏惧妨朝廷恩信，撫解其眾，酋首獲全于領，其氣隱奪。當時聞者莫不踊悅……而又窃叹此邦之人，其鋤緩棘矜之眾，犹且感激忠義若此，矧其詩書澤化之君子，岂无才武非常之士，足为国家先后御侮者哉！”蘇州唐某《剿逆說》指出，群眾在與侵略者鬥爭中，“是有畏于官，非有畏于夷也。逆夷惟官兵畏之，此輩不畏也。不聞粵東城外之役乎？官兵尽潰，而百姓一战杀其数千，擒其数百，斬其渠魁，且围逆夷之館，将尽歼焉。脫非欽差、將軍之仁，立馳令箭禁遏解救，則早无噍类，奚有今日。此百姓不畏逆夷之明证，亦足見逆夷非若天神之不可以人制也。”前引張穆論海疆善后文里說：“粵東屢遭逆夷之毒，而忠愛不衰，义櫓义旗相繼而起。閩省廈門逆夷畏民驅逐，遁不敢居。

……此真祖宗积累之厚，皇天眷佑之深，所当乘其机而利用者也。”重視群众力量，贊揚群众斗争，当然不等于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更不能认为那就是革命人民的思想。但这是从正面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影响，是一种进步思想。

关于鸦片輸入和鸦片战争，这些士大夫是坚决的抵抗派。他們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敗，遭外人挾制凌辱，是曠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要抵抗侵略，制止危机，就必须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英国侵入是中国历史一大变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根本矛盾，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认识上也得到了一些反映。

黃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提出禁止鸦片，必須采取严厉手段，“請皇上严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龔自珍《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說：“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其食者宜纆首誅，販者、造者宜劓脰誅，兵丁食者宜劓脰誅。……公以文臣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刑乱邦，用重典，周公之訓也。……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宜杀一儆百。”林則徐《密陳夷务不能歇手片》說，“……知鴉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驅除。圣人執法怨奸，实为天下万世計，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鴉片为不必禁之理。……然未有漸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懇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聞。非惟难許通商，自当以威服叛。……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振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陌生的势力，主张坚决抵抗侵略的人必然要去了解这个势力，寻求抵抗的途径。姚瑩《覆光律原书》說，海外諸夷，侵凌中国，“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

且为所挟而复开。其他可駭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姚瑩在这封信上反复申說，“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数已皎然矣。……瑩实痛心。故……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見习聞，知彼虛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淪于鬼域，岂得已哉！……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見，犹以复轍为美談也。”魏源《海国图志叙》明白地說：“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什么是夷之长技，如何学法，这些士大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軍事与近代工业，中国也应当由此着手。魏源在《筹海篇》里讲到的办法是：一、“請于广东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处，設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枪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閩粵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駕駛攻击”。二、仿效西法选兵练兵，增設水师科目。“今宜于閩粵二省武試，增設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輪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三、创办民用工业。“量天尺、千里鏡、龙尾車、风鋸、水鋸、火輪机、火輪舟、自来水、自轉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四、允許私人設立工厂。“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海国图志》里还介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天真地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把那里描繪成“惩碩鼠之貪残，而泥封告絕”的桃源乐土。^① 鴉片輸入，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对整个中国的影响，照他們

^① 最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还有徐继畲。《瀛寰志略》卷9有这方面的论述。徐继畲在鴉片战争以后任福建巡撫，主张“撫夷”，与林则徐、魏源等人政治傾向不同。

的話來說是：“方今中外汲汲，莫不以鴉片夷務為事”，“海國之局，至斯而一變矣”。

把這些士大夫的議論集中一下，基本上是這麼兩條：第一，對清政府的腐爛統治極度不滿、甚至絕望，對封建制度提出了某些懷疑，承認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封建制度的弊害在這裡受到了猛烈的攻擊。無論這種攻擊是出於懷疑封建制度還是針對一些丑惡的事物，都只是導向一個結果，動搖、瓦解封建統治；使人相信這個統治是註定要完蛋的。第二，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承認資本主義某些方面優於封建制度，要求對封建制度作一些改革，學習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道。當時沒有“向西方學習”這個概念，也不可能見諸實行，而實際上卻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捨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之前提出了這個問題。

歷史唯物主義指出，人們的意識，是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的。鴉片戰爭時期士大夫思想的變化，正是反映出那時的民族危機和封建統治危機引起了人們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的改變，引起了社會存在的改變。

馬克思、恩格斯於1850年初根據以前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從中國帶到歐洲去的消息對中國形勢作過如下的評述：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後來英國人來了，用武力達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萬的英美船隻開到了中國；這個國家很快就為不列顛和美國廉價工業品所充斥。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於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這些居民開始憤懣激怒，進行反抗，毆打和殺死清朝的官吏。“這個國家據說已經接近滅亡，甚至面臨暴力革命的威脅，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

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過去和現在一直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①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社會遭遇的危機就是這樣。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一般是經過短暫的穩定以後便漸漸走向衰敗解体。清王朝至鴉片戰爭時期已經在下坡路上疾馳。周而復始的封建王朝危機的陰影籠罩在它的上空。最顯著的征候是農村騷動增多，農民群眾因生活壓迫而捲進反抗鬥爭的洪流裡面。西方資本主義向東方發展、英國的侵略，既加深舊有的危機，又挑起了新的更嚴重的矛盾。鴉片輸入使勞動人民要替剝削階級償付進口鴉片的巨款，負擔加重。潮水般的白銀外流造成銀貴錢賤，直接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煙毒侵入貧民層，又造成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相當一部分統治者及依附於統治勢力的人吸食鴉片，威脅着地主階級的国家機器。中國在對英戰爭中失敗，更激起整個社會動蕩不寧。南京條約和以後幾個不平等條約為外國侵入中國打開了大門。中國由一個獨立國從此變成半獨立國。原有經濟生活獨立發展的進程打亂了。勞動人民首當其衝，統治者也感到某種壓力。人們不僅又一次碰到了歷史上重復出現的改朝換代的老問題，而且破天荒第一次碰到了整個封建制度破壞、衰亡和中國淪為外國殖民地或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的問題。國內階級矛盾由此更加尖銳化，全國農民戰爭的大爆發已經迫在眉睫。林則徐等人的思想不是由其他任何條件產生的，而是由這種社會條件、社會關係，這種社會存在產生的。

鴉片戰爭時期有進步傾向的士大夫思想的意義是什麼，從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思潮明確宣告：中國的封建制時期已經“開罷荼糜花事了”，中國正被迫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痛苦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頁。

道路，對於不久以後的太平天國革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預告。鞭撻封建統治，稱贊人民力量，要求抵抗侵略和學習西方，都是合乎人民利益，順乎歷史前進方向的。在那一片漆黑的時代，這些思想開榛辟莽，前驅先路，使人們看到前面有一線曙光。我們把這個思潮看做是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篇章里的一頁，原因也就在這裡。

由於揭露、批判封建統治，學習西方，是鴉片戰爭時期思潮的兩個基本內容，它對後來的影響也就主要在這兩個方面。

林則徐、黃爵滋等人指陳朝政、剖析時局的奏疏，著重於暴露封建統治的一面，也指出了需要了解外國。林則徐、姚瑩等人研究外國或者提倡這種研究的著作，著重於尋求世界知識的一面，也包含對封建統治的鞭撻。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後來人們的注意。影響最著的自然要推龔自珍、魏源的思想。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說，龔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里又說，魏源“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數新思想之明蘊，其因緣固不得不追溯龔魏”。龔自珍的著作之所以引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新學家那麼震聾，以至於“若受電然”，就是因為它“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即對封建統治的揭露和鞭撻。頭腦受封建主義蔽錮的知識分子，經過一番震聾發聵，思想獲得解放，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待世界。再加以龔自珍善於襲取儒家經典里二千多年來幾乎成為絕學的公羊學說來表述自己的社會歷史觀點，要求對現狀作某些改革，誰也不能一概指為異端邪說。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從這裡受到應當或可以批判什麼的啟示，也受到用什麼方法來進行鬥爭的啟示。魏源著作里的

“经世之术”和“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为改良主义者所瞩目，也不是偶然的。梁启超没有明言那些新学家从魏源“对外”思想受到什么启发，从事实上却可以窥见其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很注意汲取外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以后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试图把西方哲学思想同儒家、佛家思想混杂起来，解释历史，解释客观世界。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推动思想解放的潮流接连兴起。第一个高潮是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论战，第二个是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论战，第三个是五四运动以前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每一次斗争都是以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外国侵略，学习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每次都是激进思想战胜保守的思想。这些斗争又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批判封建制度主要是指向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思想，学习西方就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只有到五四运动以后才把批判封建统治和没收地主土地联系起来，学习外国把方向转换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可见鸦片战争时期有进步倾向的封建士大夫思想不只是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有启发，在全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里也一直多少保留着它的地位。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以前，农民革命是失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是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也是失败的。它们都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里面。五四运动以后，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革命才由失败转而逐步走向胜利。自那时起，再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最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凶恶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说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國度必須要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方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是經過億萬群眾無數次鬥爭實踐檢驗過的真理。這個真理的光輝是日新又新的。以林則徐等人為代表的士大夫思想指出了鴉片戰爭是曲折、豐富的中國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歷史的開端。從這一點上講，那些思想又不只是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關的。

那末，是否因此就可以認為這些士大夫思想已經很現代化、與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什麼區別了呢？是否因此就可以說這些士大夫思想只有反映時代要求的一面，而且他們之間也是整齊劃一的呢？根本不是這樣。

龔自珍、魏源算是地主階級反對派，林則徐、黃爵滋等是地主階級開明派，還有的人只是地主階級的非當權分子。這些人都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講話的，沒有誰是農民或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揭露的封建制度的危機、清王朝的統治危機，遠非矛盾的全部。對那種危機個別方面的描寫是驚心動魄的，實質問題卻往往講得不突出、不明確。他們感到舊的統治是不行了，必須重新尋找出路。出路何在？誰也不能真正離開舊的制度，另外指出前途。他們激昂慷慨批評封建統治的某些東西，但是不與當權勢力決裂；他們痛心切齒痛恨貪官污吏，卻相信好皇帝和正直大臣。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他們彼此抵觸、互相矛盾，乃至自相矛盾。他們一面要求抵抗外國侵略，一面又把人民群眾看做是危險的敵人；一面主張學習西方，一面又不改變封建統治者的立場。現實的態度和明見使他們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發出風暴已經來臨的呼聲；統治階級的地位和偏見又使他們具有傳統的濃厚的封建特色。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根本沒有觸及封建制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即沒有觸及中國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根源——地主集中土地、農民

失掉土地的問題。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天朝田亩制度”出現，是当时土地問題严重到什么程度的集中說明。地主階級思想家絕不会看不見这个封建社会矛盾的根源。他們不敢像农民那样提出問題，只是不敢正視这个殘酷的现实。凡此种种，都属于鴉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消极保守的一面。即使某些最有天才的思想家也要受其階級地位严格的限制，要强烈地表现出这一面。总之，这些士大夫思想有民主精华，也有封建糟粕。民主思想还夹杂着封建糟粕。封建士大夫的毛既然傅在地主階級的皮上面，不这样是不可能的。他們在对外斗争中有某种依靠人民的思想，在国内階級斗争、农民革命时又坚决站在与人民相对立的地位，这也完全合乎統治階級的性格。統治者内部一部分人长于制造某种思想和幻想，另一部分人对那些思想和幻想比較消极，两者可以发展为相互对立。一旦发生某种冲突，階級本身受到威胁，那种对立便自行消灭。历史上常常有这种事情。这些士大夫里有少数人在太平天国盘桓过，但他們是由于被迫，并且总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

辯证唯物主义不承认人类生活里有什么“純粹的”現象。资本主义思想里还会有封建主义和小市民意识掺杂其间，何况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統治階級内部的开明思想或叛逆思想，不应该离开实际斗争，过高估計它的意义；同时，也不可脱离历史，否定它的客观意义，特别是当这种思想与人民反抗斗争在一定条件下相联系的时候。

与这些士大夫思想有关的还有一个士林风气問題。

龔自珍在他早年的作品《古史鈎沉論》里对清代士风卑下作过尖銳的評論。他形容当时的士人有的以仆妾姿态阿諛取容，有的像狗馬一般卑賤，去追求功名利祿。士人們沒有操守，沒有志节，“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他还指出，士林风习卑下是

統治者為巩固自己的權位，長期震蕩摧鋤士人的廉耻，蹂躪天下人才造成的。鴉片戰爭時期清政府的控制力量削弱，過去噤若寒蟬的士人又漸漸趨向活躍。《水窗春曉》記載：道光十五六年後，都門若干士大夫談論時政，發起禁烟。“一時文章議論，掉鞅京洛，宰執亦畏其鋒”，其中包括黃爵滋、徐寶善、朱琦、蘇廷魁、陳庆鏞、吳嘉賓、梅曾亮、臧紆青、張际亮、江开等人。^①林則徐、黃爵滋、姚瑩等在這些人中最有影響。他們以講求經術文章，砥礪志節相標榜，不屑于与世浮沉。王鼎為當時著名正直大臣。龔自珍賦詩獻給王鼎，直率地要求他負起自己的責任，不要因為年老而消極退縮，和那些沒有肝腸，殺人不見血的大官僚一樣。龔自珍的鋒芒畢露的批評，連魏源也認為有點過火，想替他改得緩和一些。陳庆鏞一疏劾琦善、奕經、奕山等三親貴，名望很高。張穆《與陳碩南先生書》批評他滿足于結納名士，不肯閉戶自精，讀書味道；見面只有些泛泛不关痛痒的語言，講不出研究學問的心得，長此下去很危險！陳庆鏞不以為忤，稱贊張穆的才能高過自己。講求經術文章，就是在學術研究上從脫高實際、崇尚空疏，轉向注重研究現實問題。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聖武記》、姚瑩的《康輅紀行》、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張穆的《蒙古游牧記》、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夏燮的《中西紀事》、梁廷枏的《夷氛紀聞》和包世臣論述漕運、鹽政、銀荒、鴉片等問題的作品都是這時出現的。討論邊疆和外國歷史、地理，紀述當代政治鬥爭、經濟生活，蔚然成為風尚。滿足某種現實需要，是這些作品的共同出發點。封建制度注定了知識分子中的糜爛風習，現實鬥爭又要求減少它的腐蝕。鴉片戰爭時期的社會思潮

① 陳庆鏞《箱經堂集稿》卷12，《江寧展謁後序》載有1836年參加陶然亭集會的人名錄。其中黃爵滋等若干人見于《水窗春曉》，另有蔣湘南等三四十人。他們大多數官位不高，并出生于南方各省，對鴉片流行情況比較熟悉，要求禁烟。